



政协重庆市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 1 辑

23

前 言

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个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其斗争内容之丰富，发展道路之曲折，是我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征集和整理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具有重大的意义。

以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的文史资料可以“弥史之缺，参史之误，详史之略”，是修史、修志、进行历史研究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材。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一条团结各界人士及其后代的重要纽带，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市中区是伟大祖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山城重庆的心脏，西南经济的中心，交通的枢纽，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近百年来，这里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出现过不少具有历史影响的人物。市中区政协于一九八四年组建了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四、五年来，征集到约三十万字的史料，除全国政协选用四篇，广东省政协和湖南省政协各选用一篇以外，已陆续编纂打印了《文史资料》十三期。现在出版的这本《重庆市中区文史资料》第一辑就是在此基础上选编成册的。在它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我们衷心感谢中共重庆市中区委的关怀、区人民政府的支持和市、区政协的协助，并望各界人士继续为本刊提供史料，共襄盛举。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政协重庆市中区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月

《重庆市中区文史资料》

第一辑

目 录

一、政治：

1. 深切怀念周总理……………张茂延（ 1 ）
2. 重庆谈判见闻录……………王抡樵（ 7 ）
3. 蒋介石入川前后刘氏兄弟叔侄间的明争暗斗……………陈克蒙（ 11 ）

二、工商经济

1. 重庆宝元通公司概况……………陈弄凉、陈鸿（ 16 ）
2. 回忆解放前的重庆西大公司……………刘仁耀（ 48 ）
3. 重庆制面业简史……………刘仁耀（ 60 ）
4. 重庆广户氏老胡开文笔墨庄的回顾……………罗子杰（ 65 ）

三、军事

1. 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抗日的回忆……………许维新（ 71 ）
2. 回忆杨森集团参加抗日战争史略……………唐宋元（ 81 ）
3. 曾庆集率部起义前后……………刘鹤年（ 92 ）
4. “台湾人员训练班”的概况……………薛祚光（ 97 ）
5. 国民党空军沿革……………贾 超（ 99 ）

四、文化教育

1. 重庆市中区图书馆沿革……………雷永佑整理 (109)
2. 景德幼儿园的建立和发展……………陈伟整理 (111)
3. 重庆市聋哑学校……………张凤林整理 (115)
4. 陈罗怀清与九经·游艺·树坤学校
……………武建政整理 (118)

五、人物轶事

1. 在但懋辛同志身边见闻纪要…但功泽、寇思敬 (124)
2. 冯玉祥将军二·三事……………王抡樵 (129)
3. 亲聆吴玉章同志的一次演讲……………王忠笃 (131)
4. 她在烈火中永生
——与胡其芳烈士交往二、三事 ……寇思敬 (133)
5. 梅际郇及其《念石斋诗》……………刘中一 (137)

六、方志

1. 重庆古城考……………董其祥 (155)

深切怀念周总理

张 茂 廷

中国民主同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它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组织成立的，也是在周总理的总怀下成长壮大的。我父亲张澜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十四年，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支持。

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汉口召开第一届参政会时，周总理与我父亲张澜见面。我父亲以教育界人士身份出席参政会，他在会上敢说敢为，与爱国民主人士取一致态度，影响很大。会后国民党政府迁来重庆，周总理特指定周怡同志与他联系。周怡是我堂兄张进人的同学，由张进人引见认识了我父亲，从此周怡同志就常与我父亲往来。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在日伪诱降和德意劝降下，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矛头指向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方不断发生摩擦，影响抗日。参政会中部份参议员张澜、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梁漱溟等，在周总理的推动下，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要求抗日、反对中途妥协投降，要求进步、反对倒退，与我党合作，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以后发展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一九四一年初。一九四〇年底我由省女中高中毕业，因父亲和妹妹在重庆，我就由成都到重庆，一方面照料父亲，一方面复习功课，准备暑期考大学。我们住在“特园”鲜特生老伯家。那几天正是“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来往

“特园”的人很多。父亲对蒋介石政府极为不满，周总理十分重视，将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周总理差不多天天来“特园”，在父亲房里有时相谈很久，有时说几句话就走了。他来的时候常带一个警卫员（四川人），警卫员等久了就在门外与作通讯员的堂兄张楣光摆谈。他向张楣光讲述延安的情况和他的生活待遇，如吃饭不给钱，衣服是公家发的，肥皂也是公家的。张楣光听了非常新奇，非常向往，想到延安去。警卫员说：“二天（四川话，以后之意）有机会我介绍你去”。父亲每天吃完中饭要小睡片刻，有一次周总理来，他正在午睡，周总理想到他年纪大，频频摇头，制止不要叫醒他，独自一人在鲜家大客厅等待。父亲醒来听说：“周先生来了”用责备的口气说：“为什么不叫醒我！”那几天父亲常写信叫张楣光送到曾家岩周公馆，周总理住的地方，即曾家岩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有时周总理又写几句话叫他带转来。周公馆二楼有特务监视，“特园”四周也有特务监视，但是周总理的大无畏精神，似乎从来没有感到这些人的存在。周总理的浩然正气，也使得这些小丑不敢轻举妄动。

“皖南事变”时，民主政团同盟还没有组织成立，当时虽然有统一建国同志会，但人数不多，力量不强，不足以调解国共纠纷。周总理一方面向各民主党派、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界人士揭露何应钦等顽固派的反共罪行，一方面帮助酝酿把主张抗日的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较大的团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父亲是无党派人士，本来不愿参加党派的，经过周总理说服，以统一建国同志会发起人资格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先是黄炎培任主席，后来黄炎培辞去主席职，有人推张君勱，青年党反对。周总理在民主人士间做工作，推荐我父亲张澜任主席。

在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意欲发动内战，取媚日本，是很不得人心的。顽固派做贼心虚，企图掩饰这一罪行。周总理奉党中央的指示，在军事上采取守

势，在政治上采取攻势，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声明如果国民党不接受十二条，中共参政员即不出席该届参政会。周总理并将“十二条”分送给各民主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政员。我父亲张澜、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十二人立即集会，商讨办法，上书蒋介石，一一签名于其上。蒋介石怕事态扩大影响他的声誉，一面封锁消息，不让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知道；一面约见我父亲、沈钧儒、张君勱、左舜生、黄炎培、褚辅成等六人。他们向蒋介石提出了四条意见，第一条即是参政会开会，中共参议员必不可少。蒋介石逼于国内外压力（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是主张国共合作的），假意允诺。六人中有沈、梁、黄、张信以为真，他们出于爱国热情，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指导思想下，两次到曾家岩五十号会见周总理，希望我党再作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周总理高瞻远瞩，以坚定的态度反复解释不出席的原因。为了揭露蒋介石的丑恶罪行，逼使蒋介石在参政会上把问题谈了出来，公诸于世。结果，果然制止了一次妥协投降阴谋。在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的时候，《新华日报》撰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真象”等类传单和小册子，周总理托人送来“特园”。父亲放在桌上，分发给来往的客人和亲友。当时的活动，奠定了日后民盟与党肝胆相照的基础。

有一次闲谈，谈到周总理，父亲向我们说：“他认识你二哥”，究竟怎样认识的，他没有说。直到前年，我拜访了外交部章文晋老部长（他与我二哥张罙在德国同学），他告诉我们：张罙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二七年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马列主义经济学，担任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一九三〇年四月周总理秘密到德国，是张罙接待的。张罙请他在德国支部讲话。周总理讲了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前的情况，我党在农村建立工农武装，成立苏维埃政权，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内容。张罙和宣传委员成仿吾把它译成了德文，在《红旗报》上发表，受到德国共产党重视。

《红旗报》为此写过一篇专题讨论。张罅一九三六年秋奉党中央命令回国，开展地方实力派工作，一九三八年病逝。第一届参政会在汉口召开，适逢周总理在汉口，周总理向父亲致以亲切的慰问。

一九四四年春我在成都大学读书，总感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空气沉闷，不自由，连看《新华日报》也不允许，想去延安，但闻去延安路上国民党军警重重封锁，不易通过。传说新疆社会主义学院有好教师，比较自由。父亲在重庆，我写信给他，他向周总理提说。周总理很关心，告诉父亲说，盛世才既反蒋，也反共，不能去。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同学中有人去中原解放区，我又向父亲谈起要去。周总理托徐冰同志向父亲说，中原解放区还未巩固，缓些时去。以后国民党拉开了内战序幕，中原解放区撤退了，我也就留下来了。

一九四四年十月在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等的发动下，华西坝五大学七个学术团体召开“国事座谈会”，父亲应邀参加。在会上他发言最激烈，吹响了学生进军号角，支持了前方的军事行动，周总理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九四五年五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中国的问题是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中共七大，毛主席作了《论联合政府》报告，主张组织成立以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为主体的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周总理为此日夜操劳，来往于各民主人士和参政人员之间，协商促成国共之间开诚布公的谈判。而国民党的六大竟片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并想在第四届参政会上挟持通过国民党一手包办的足以造成国家分裂的所谓“国民大会”的决议。周总理洞悉其奸，庄严声明反对召开伪国大，并决定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当时由于国民党宣传“开国民大会是制定宪法，还政于民”，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参加了参政会，以周总理为首的我党参政员和张澜没有出席，这就使得周总理更加

相信我父亲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顽固派撕毁政协决议，一意孤行，召开伪国大。民盟中的青年党在政协时期就被拉过去了。这时候民社党在盟内蠢蠢欲动，使得在南京的第三方面人士意见分歧，民盟面临严峻考验。到了提名的最后关头，周总理清晨一早赶到兰家庄民盟总部，提醒黄炎培和周新民，打电话到重庆征询张澜的意见。父亲在电话中简短有力的说：“决不能交名单呀！决不能交！”由于声音大，在旁的周总理听了，露出一丝微笑。这样就稳定了动摇者，民盟由此作出了不参加伪国大的决定，立即送报馆发表。假若那一次参加了伪国大，国民党孤立共产党的阴谋得逞，民盟的政治生命就完了，没有今天了。民盟能够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胜利并继续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与周总理的关怀分不开的，我们要永远纪念他。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我随父亲到北京，火车刚到站，周总理就出现在车门前。父亲急忙下车，周总理迎上前来，紧紧握住父亲的手，频频摇动，连声说：“表老，你好！你担了风险，我们感谢你！”第二天周总理又到北京饭店父亲下榻的地方来看望他，谈到父亲在上海被特务软禁，国民党欲抛其屍入黄浦江一事时，周总理说他指示了上海地下党和进攻上海的部队保护父亲，父亲十分感谢党。党是不会忘记为人民作过好事的人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是常到我们家来的两位高级领导同志，当时父亲已身患重病，不常出门，周总理仍一如既往，每遇国家有大事即来家和父亲商谈。记得高岗的问题揭露前半年，周总理即来家向父亲说了。有关西南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建设人才等问题，经常与父亲商谈。此外还征询一些需要保护的對象，如解放初卢作孚之死和川大教授魏时珍被误会集中到成都南较场受训事。周总理根据父亲的意见，电示成都认真调查，并释放了魏时珍。

一九五五年父亲病重住院，周总理日理万机，还在百忙中抽空去看父亲。父亲向着总理说：“希望早日解放台湾！”不久，父亲怀着祖国统一的愿望与世长辞了。父亲死后，周总理亲自扶灵，送至八宝山烈士公墓安葬。而今周总理逝世已十二年了，老一代革命家在为国家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中结成的友谊，如日月之光辉，虽然事隔多年，还历历如在目前，它鼓舞我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余热。

重庆谈判见闻录

王 抡 桢

载入史册的重庆谈判，距今已四十一年了。这震撼人心的四十三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一九四五年我在重庆中央日报社编辑部工作，八月十五日深夜收到中央通讯社发来的新闻稿，赫然有蒋介石主席八月十四日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邀请毛主席来重庆共商国家大计。我们读了大为震惊，这样重大的事件，在国民党中央党报编辑部工作的人，事先竟毫无所悉，感到突然，不知如何处理这条新闻才好。

这时，中央日报社社长胡健中来到编辑部，与总主笔陶希圣、总编辑陈训悉商谈此事。陈训悉是陈布雷的亲弟弟，他在谈话中透露，这个电报不是陈布雷草拟的，处理更要特别慎重。他们三人研究决定，今后这类稿件，一律交陈训悉亲自处理，我们这些搞编辑工作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蒋介石一连发了三封电报，邀请毛主席来重庆和谈，措词比较恳切。如八月十四日第一封电报说：“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八月二十日第二封电报说：“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八月二十三日第三封电报说：“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 · · 7 · ·

后来我们才听说这三封电报是吴鼎昌代蒋介石草拟的。吴鼎昌是国民党政学系的头目，当时担任国民政府的文官长。他青年时期留学日本时，少对外活动，闭门读书练字，以工于心计、善写条陈著名。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由延安飞来重庆，同行的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将军。毛主席等于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受到各方人士的热烈欢迎。

毛主席一到重庆，就带来一派祥和的气氛。蒋介石当晚八时在林园官邸设宴，为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等洗尘，特别叫蒋经国作陪。席前蒋介石和毛主席几次举杯互祝健康，蒋经国频频举杯向毛主席等祝酒。

当天晚上，蒋介石请毛主席等留宿林园。这是林园官邸建成后第一次留宿外客，也是蒋介石对中共代表的特殊礼遇。

第二天早晨，林园鸟语花香，清风送爽。毛主席从二号楼住所出来，兴致盎然，信步进入花丛，不觉走到三号楼前的林荫深处。三号楼是蒋介石处理机要的办公地点。这天早晨，蒋介石也来花园散步，与毛主席不期而遇。他们两人握手言欢，就坐在路旁石桌边畅谈起来。

这次亲切的谈话，缩短了国共两党的距离，给重庆谈判达成协议起到好的影响。为这次不平凡的历史性会见作证的石桌石凳，今天仍保持原状在林园林荫深处供人凭吊。

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对新闻言论的处理力求慎重，不轻易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新闻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标题尽量平实稳妥，在版面上不要求太突出。就是蒋介石与毛主席直接会谈的消息，《中央日报》也只在国内要闻版上用两栏标题刊出，不摆在显著的地位。

但是《中央日报》的记者在重庆谈判期间活动却非常频繁，

将了解到的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意图和民主人士的倾向，写成内部资料交给陈训悉供上级参考。对毛主席和周恩来每天的活动均作了详细记录。

重庆《扫荡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宣传方针与《中央日报》是一致的。该报采访主任谢爽秋一九四四年曾参加中外记者访问团去过延安，见过毛主席。扫荡报社社长黄少谷叫谢爽秋在重庆谈判期间直接去访问毛主席，希望得到特殊的材料在报上发表，走在《中央日报》的前面。

解放后，我才知道谢爽秋是中共党员，经党组织批准，一九三九年进入《扫荡报》任记者，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主席处理谢爽秋访问这件事非常机智，他知道黄少谷的意图后，写了几句话，重申中共和谈诚意，希望大家都要和平解决问题。毛主席向谢爽秋说，你回去向黄少谷说，我只讲了这个话，报上发表时不要改变我的话，改变了我就要否认。黄少谷结果一无所获。

毛主席谈话就这样富有风趣。他有天下午在张治中公馆会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的负责人王昆仑、许宝驹、屈武、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等。大家对国共和谈究竟有无达成协议的可能有些担心。毛主席风趣地说：“我看，国共两党结婚不成问题。”侯外庐、谭惕吾等认为老头子和年青人恐怕难成姻缘，表示希望渺茫。毛主席幽默地说：“不行的话，把老头子的胡子刮一刮不就行了嘛！”

国共两党代表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下午在曾家岩桂园客厅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人称《双十协定》。

纪要第二条规定：“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根据这一规定，政治协商会议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国民政府礼堂（现重庆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揭幕。经过二十二天的协商通过了和平建国纲

领等五项协议，给中国带来一线和平民主的曙光。由于历史的曲折，这些协议并未实现，人们称这次会议为旧政协。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北平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才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蒋介石入川前后刘氏兄弟叔侄间的明争暗斗

陈克蒙

一、蒋介石入川以前

刘湘是刘文辉的侄儿，住家均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两人所受的教育均得力于刘文辉的大哥刘升廷。他俩在青年时代分别考上了保定军校和军官速成学校。结业后，各自到部队由参谋而营长、团长、督办、总指挥、省主席。10多年来，两人的感情一直都是好的。

1925年，杨森发动统一四川的战争。刘文辉是四川陆军第九师的师长，驻防宜宾，兵力只有五个团，力量很弱。杨森的重兵逼近宜宾，刘文辉无可奈何，只好逃到重庆，依靠刘湘。继后，二刘组织联军，西上进军，杨森的部队部份投降，部份打败，统一战争暂时结束。刘文辉的部队扩大了，官也当大了。这些都是刘湘的帮助和支持。

杨森被打垮，刘湘任四川军务督办，刘文辉任帮办，四川的军政大权都在他叔侄二人手里。他俩在同一时间里进驻成都。两人的公署均设在将军衙门。两人天天见面，时时会商，一切均无异议，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了。为什么到后来两人会发生矛盾，争个你死我活呢？这有以下的原因：

刘湘于1929年召集刘文辉在泸县开会，内容是统一云、贵、川三省。刘文辉的任务是回成都后盯着邓锡侯和田颂尧两部，其他部份由刘湘负责，用和平方式或用武力征服，视情况变化而

定，决策是先从四川下手。

刘文辉回到成都，因与邓、田两人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顾虑重重，始终难以下手。

邓、田两人早已有所察觉，为了对将来的真刀真枪斗争作好准备，他们用软的方法对付刘文辉。他们故意抬高他，让他事事占上风，一切权利都让给他。继后又组织三军联合办事处，以向育仁为处长，目的是利用刘当和事老和吹鼓手，天天喊团结，不要分裂。

刘文辉由主动变被动，手足都被绑紧了，泸县会议的决定忘得一干二净。刘湘在重庆老等下手消息不得回音，于是，刘湘对刘文辉的怀疑逐渐发生。

刘文辉与刘湘的性格完全不同，他没有什么大志，认为命运主宰一切，如斯而已。刘湘想向外发展，又恐势单力薄，不能不联合刘文辉。刘文辉空谈统一，毫无行动，刘湘又急需要的是行动，乃唆使田頌尧在成都与刘文辉发生了市中区的巷战，与邓锡侯发生了郫河的争夺战。刘湘早有搞垮保定系的决心，刘、邓、田争雄，刘湘则袖手旁观，坐收渔人之利。

刘文辉是刘文采的亲胞弟，刘文采的川南水陆护商总处总办是刘文辉委任的。所辖四十余县的税收人员多数是刘文采委任的。刘文辉派人去拨款，总是受到刁难，很使刘文辉头痛。弟兄间的矛盾，因此而发生了。

刘文采的叙南清乡司令官，也是刘文辉委任的。司令部辖两个团，还有地方团队约两营。刘文采认为兵力太少，要刘文辉成立两个团。刘文辉的回答是，没有枪弹，没有钱粮。刘文采听了不吱一声，就气冲冲地走了。

刘文采的野心很大，把他的黑手伸向了重庆。在重庆组织暗杀团，刺杀刘湘。暗杀团的成员全是一些书生、胆小鬼。刘湘严令搜察时，这些胆小鬼都吓跑了，地方人士对此议论纷纷。约一

个月后，刘文采来到成都，与刘文辉见面，刘文辉说：“五哥，你太愚蠢了，刺死刘湘，对你有什么好处？他的防地和部队，你能弄到手吗？这叫我如何对付？”刘文采不吱一声，便生气地走了。兄弟两人，以后更少见面了。

重庆的刘湘，自从发现刘文采组织暗杀团以后，对刘文辉更加仇恨。誓将他兄弟两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刘湘在1932年向刘文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此时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对刘文辉毫无帮助。1934年秋，刘湘部队攻至成都，刘文辉退守雅安，刘湘部队跟踪追击，向雅安城内发射炮弹，刘文辉又退守凉关。刘文辉的兵力减少了，人员分散了。刘文辉抱听命于天的态度。在此危亡之际，刘湘的模范师师长刘崇云和刘文辉的大哥刘升廷，竭力向刘湘说情，刘湘很生气地说：“好吧，给刘老么留一点根，让他进驻雅安城”。

刘文辉驻进了雅安城内，重新组织军队，旧人员只剩30多人了。

1935年2月，刘湘派他的绥署副官长梁克明来到雅安，商议要刘文辉交出雅属防地，各县官吏由刘湘委任，军队行动一切开支，完全由绥署支付。

至此四川真正统一了，20多年来的内战宣告结束，内战虽然结束，但刘文辉弟兄俩，对刘湘的矛盾，始终未能消除。刘文采在刘文辉退守雅安不久，他怕刘湘对他不利，也逃到雅安来了。刘文辉对他不埋，不到一年，回乡间去了。

二、蒋介石入川以后

刘湘统一四川不到一年，这时红军长征，蒋介石也进驻成都，在盐道街召集川军将领训话。第二天刘湘来到刘文辉家里，这是他们叔侄几年来第一次的见面。刘湘说道：“昨天的训话，你听清楚了么？说这次剿共中，四川个别将领不甚出力。”刘文